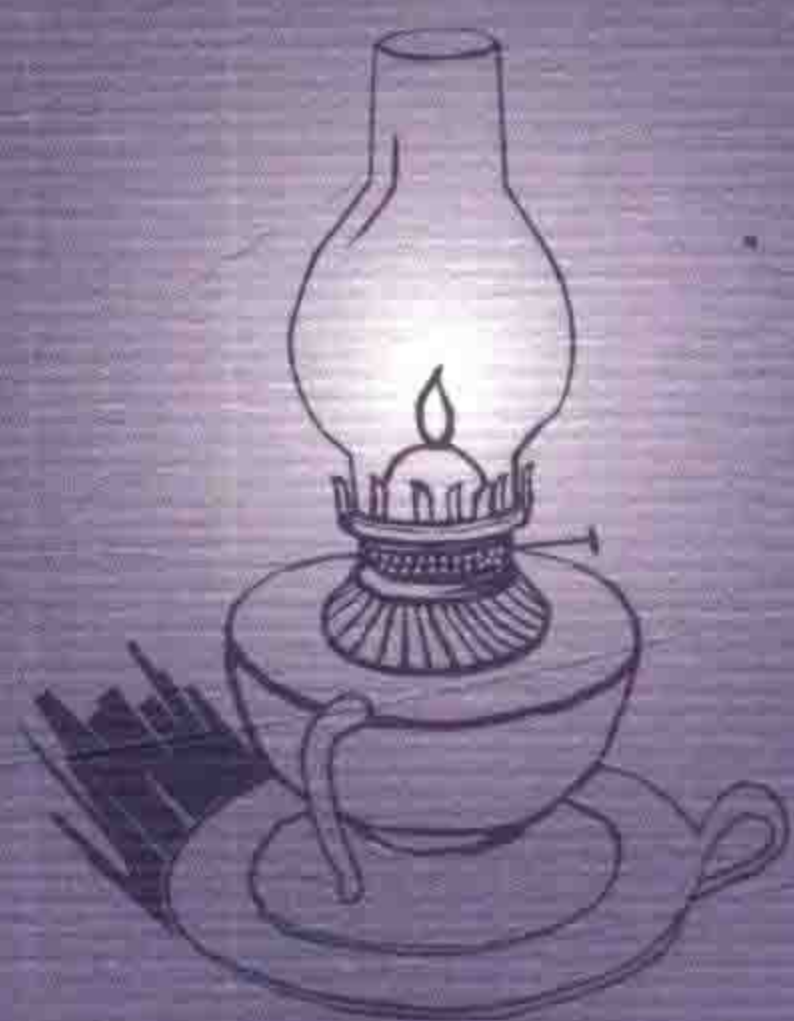


王富仁 著

鲁迅与顾颉刚

· 纪念 ·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百周年



創刊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王富仁 著

鲁迅与顾颉刚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顾颉刚/王富仁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8
ISBN 978-7-100-16069-8

I. ①鲁... II. ①王... III. ①鲁迅(1881-1936)-
人物研究 ②顾颉刚(1893-1980)-人物研究 IV.
①K825.6②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696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鲁迅与顾颉刚

王富仁 著

封面题签:陈建华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69-8

2018年7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9.75

定价:68.00 元

王富仁(1941—2017)，山东高唐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汕头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20世纪80年代，王富仁教授以“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全新视角阐释鲁迅小说，这是中国鲁迅研究史上里程碑式的成果，也是新时期中国文坛思想启蒙的重要标志。此后，他又致力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国左翼文学研究，晚年更鼎力倡导“新国学”理念，皆成就斐然，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作者主要著作一览

《鲁迅前期小说与俄罗斯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

《先驱者的形象》，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文化与文艺》，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

《灵魂的挣扎》，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

《历史的沉思》，陕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蝉声集》，北岳文艺出版社，1996年

《蝉声与牛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现代作家新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王富仁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2010年

《呓语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说说我自己》，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

《突破盲点：世纪末社会思潮与鲁迅》，与赵卓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中国的文艺复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古老的回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2014年

《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语文教学与文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

《王富仁序跋集》（上、中、下卷），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

出版说明

本书是王富仁教授生前所撰《学识·史识·胆识》系列论文之一种,原文共分44节,其中第1—29节改题《鲁迅与顾颉刚》分别刊于《华夏文化论坛》第13—16辑。2017年3月底,《现代中文学刊》向王富仁教授约稿,先生慨然允诺将剩余的第30—44节交付《现代中文学刊》发表,谁料未及刊出,先生于5月2日遽归道山。为此,《现代中文学刊》经先生长子王肇磊确认,以《学识·史识·胆识(其四)——〈鲁迅与顾颉刚〉续篇》为题分两期刊出这篇遗稿,以资纪念。

时值王富仁教授去世一周年,本馆经先生后人授权,将此长文以单行本形式出版,以追念先哲,寄托哀思。原文发表时仅划分章节,未拟标题,为使读者更直观地了解行文内容,编者根据文意,将原文44节略作合并,分为6篇39节,并代拟了篇名和节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2018年4月

序

陈子善

王富仁兄是我的畏友。但是，哪一年认识他，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现在竟想不起来。这种遗忘好像很不应该，却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当年太自信了，自以为记忆力强，不必记日记或记事之类，而今已悔之莫及。

不过，首次与富仁兄见面，一定与我们共同从事的专业，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相关，也应是不争的事实。我现在只能推测，认识他，应该在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留在北师大执教之后。他是李何林先生的博士生，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位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单是这二条，就令人刮目相看。李何林先生与唐弢先生、王瑶先生一起，为改革开放之后首批招收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导师，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他就在中国新文坛崭露头角了。富仁兄师从李先生，自是他的幸运，而李先生有富仁兄这样的高足，想必也会感到自豪。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与富仁兄见面的机会多起来。这是有合影为证的。一次是90年代末在浙江桐乡的合影，照片上人很多，有钱理群、张梦阳、葛兆光、夏晓虹诸位，富仁兄正好和我对面而站，大家一起在观赏桐乡钱君匋艺术馆的藏品。这次同仁会聚桐乡，是参加黄育海兄主持的浙江人民出版社重新编注《鲁迅全集》的启动会议，不料这件有意义的工作后来被迫中止，却留下了与富仁兄这张难得的合影。另一次是新世纪之初，摄于西安，我们一起在陕西师大开会，照片上富仁兄与刘勇、陈国恩、罗岗诸位和我并排合影，富仁兄笑容灿烂，右手亲切地搭在我肩上。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没过几年就患上了绝症。

无可否认，富仁兄抽烟太厉害了，厉害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又有一次在重庆开会,我俩都很早到餐厅用早餐。不过,他不急于去选取食品,而是坐下来先抽烟。我不禁好奇地问:老兄一大早就烟瘾发作?他乐了,不慌不忙从西装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包烟。看着我吃惊的眼神,他狡黠地笑了笑,再从长裤左右口袋中掏出两包烟,像变戏法一样。好家伙,堂堂大教授成了魔术师一般。他得意地告诉我,一天至少五包烟,不一大早开始抽,怎么抽得完!看来古人说的人无癖不可交,在富仁兄身上也应验了。他的烟癖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是如此有名,烟给了他许许多多“烟土披里纯”,但也终于缩短了他的寿命,以至他离去后,我的挽联上句是“腾云驾雾,得迅翁真传”,这完全是写实。

回想起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每次见富仁兄,谈的都不是学问,都不是我俩所从事的现代文学史研究,而是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行之所当行,止之所当止,北方人所谓侃大山,南方人所谓嘎讪胡是也。也许我俩都认为既然难得相见一次,干脆就纯粹聊天,反而比一本正经论文说艺来得更有趣更有意思。若说要与学术相关,大概只有一次,那就是我听说他在某次鲁迅研究会后态度严正地直斥某人。后来见到他,忍不住求证,果有其事否。他不直接回答有或没有,只说了一句:“太不像话了!”

说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众所周知,富仁兄擅长宏观研究和理论阐发,而我醉心于微观研究和史料爬梳,虽然我俩对现代文学史许多问题的看法相同或接近,但我一直很钦佩他的学问和敬重他的探索勇气。他胸怀高远,他视野开阔,他看法独到。他的文章汪洋恣肆,颇有气势,无论专著还是论文,都有一种充满激情、富于雄辩、直指人心的力量。这在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并不多见,也是我所难以企及的。从出版专著《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到反思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鲁迅研究史,到倡导“新国学”,富仁兄一直旗帜鲜明地站在维护和发扬真正的“五四”精神、总结和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沿,为自己的见解、自己的主张锲而不舍,义无反顾。

富仁兄有自己的操守和追求,但他并不墨守成规,也不画地为牢,

与我这样的朋友也很谈得来,常常在谈笑中流露出他天真可爱的一面。难得的是,他的包容和与时俱进,同样体现在对学生的培养上。他对学生不强求一律,而是因材施教,尊重并支持学生的学术兴趣。他指导的硕士生宫立对文学史料着迷,他亲自致电我,郑重推荐宫立报考我的博士生。后来宫立的成长也证实了他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力并非每个研究生导师都具备的。

我主编《现代中文学刊》以后,富仁兄理所当然成为我的重要约稿对象。承他不弃,时有新作贻我,如《学刊》2012年第1期就发表了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樊骏论〉之一章》。当我得知他病中仍在奋力撰写《学识·史识·胆识》的系列论著时,就很希望他能惠稿。《学识·史识·胆识》大概是富仁兄后期最有分量的学术论著,前三篇专写胡适,分别是《胡适与学衡派》《胡适与“五四”新文化》《胡适与“胡适派”》,刊于2014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第5期和《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也构成了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一部分。而这一系列论著的第二部分就是这部《鲁迅与顾颉刚》,前29节连载于《华夏文化论坛》第13—16辑,而他慨然允诺把此文后15节交《学刊》刊出,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鼎力支持。令我十分痛惜的是,《鲁迅与顾颉刚》后15节在《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3、4两期发表时,富仁兄已不及亲见了。

在简要讨论富仁兄这部精彩的力作之前,略为回顾一下顾颉刚与鲁迅的交往过程,也许是必要的。据鲁迅日记,两人1924年10月12日首次见面,是日下午顾颉刚随鲁迅学生常惠(常维钧)一起拜访鲁迅。一个多月后,鲁迅应顾颉刚之请,为他主编的《国学季刊》创刊号设计了颇有特色的封面,这是鲁迅设计的第一种杂志封面,不能不特别提出。此后两人互有通信,顾颉刚1926年6月15日寄赠鲁迅新著《古史辨》第一册,并在环衬上题字“豫才先生 审正 颉刚敬赠”。同年9月8日,也即鲁迅抵达厦门的第五天,同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即拜访鲁迅并赠《诸子辨》(宋濂著)。9月22日,顾颉刚又赠鲁迅其所编的《吴歌甲集》,环衬上又题字“豫才先生评正 颉刚敬赠 十

五、九、廿二厦门”，此书和《古史辨》第一册至今仍保存在鲁迅藏书之中。

从以上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出，鲁迅与顾颉刚虽然交往并不频繁，最初还是较为友好，顾颉刚对鲁迅是尊重的，多次赠书求教；鲁迅对顾颉刚也给予了帮助，有求即应。当然，两人的矛盾在厦大时已逐渐开始显现，鲁迅1927年4月26日致孙伏园函中已有所提及。此后发生的事，凡读过鲁迅杂文《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鲁迅1927年5—7月间致章廷谦、台静农、江绍原等人的信以及所做历史小说《理水》的，应该都已熟悉，不必再赘言了。

显而易见，富仁兄并不满足于对鲁迅与顾颉刚关系始末的简单追溯，或者说这不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他更关心的是鲁迅与顾颉刚为什么会交恶，他们在思想上和学术上有多大的分歧，力图在更大的文化背景即近代以来中国思想和学术思潮的风云激荡中来把握和理解鲁顾这件历史“积案”的实质。用富仁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之所以花费如此长的篇幅清理这件‘积案’，是因为它实际牵涉到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一系列重大分歧，并且直至现在这些分歧还常常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不能不正视它们。它是在当时历史时代两个‘大师’级人物的‘互视’关系中发生的”。确实，在这篇长文中，富仁兄探讨鲁迅和顾颉刚学术思想的形成和来龙去脉，探讨他俩因文化上的分歧而导致情感、情绪上的对立，在此基础上还重新审视“整理国故”和古史研究、胡适和“胡适派”、“现代评论派”和英美派学院精英与鲁迅的分歧等众多复杂问题，分析论列，直抒己见。富仁兄坦率承认“根据作者本人的看法，本文更多地谈到顾颉刚的缺点和不足”，但同时也强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些后辈学子有理由、有资格轻视顾颉刚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地位”。这种对待历史人物客观而全面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也深得我心。

总之，富仁兄这部《鲁迅与顾颉刚》是厚重的，也是尖锐的，全文高瞻远瞩，思辨严密，博通精微，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的看法，不仅对我们重估鲁顾之争，而且对我们进一步深入反思20世纪中国的学人、学术

和文化,均不无启发。在我看来,这部著作与其说是富仁兄最后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如视为他的精神遗嘱或许更为恰当。因此,不管赞同富仁兄的观点与否,它都值得我们珍视。

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的贺圣遂兄常读拙编《现代中文学刊》,他读到了《鲁迅与顾颉刚》后 15 节,大为叹服,立即致电我询问此文前半部情况,明确表示愿意出版全书,以纪念他所尊重的富仁兄。我感谢圣遂兄慧眼识宝,于是,写了以上这些话,以寄托我对富仁兄的思念。我相信,虽然富仁兄已经离我们远去,但纸墨寿于金石,他留下的文字会一直伴随我们在思想和学术探索的长途上继续前行。

2018 年 5 月 2 日王富仁兄周年忌日于海上梅川书舍

目 录

出版说明	001
序	陈子善 001

第一篇 疑 古

“整理国故”:胡适的历史观	003
顾颉刚的古史研究	009
鲁迅的批判:“专门家”与“博识家”	018
顾颉刚和胡适:错位的嫁接	028
由来有自:汉代今古学之争	033
清代今古文学与“五四”新文化	039

第二篇 对 立

章黄学派	049
章太炎对鲁迅之影响	057
鲁迅对章太炎之评价	061
鲁迅的古史观	066
鲁、顾眼中的《史记》	070
对立之根由	076

第三篇 异 化

文化对人的异化	089
“《中国小说史略》抄袭说”事件	094
面子问题	103

面子观念之根源	121
“五四”之后的文化观念	127
鲁迅与英美派学院精英之矛盾	134
 第四篇 敬 业	
鲁迅与胡适	147
个人崇拜	154
“现代评论派”与鲁迅	163
杨荫榆与女师大事件	169
整顿学风：章士钊时期的中国教育	178
重看杨荫榆事件	192
鲁迅的“敬业”精神	198
 第五篇 克 星	
鲁迅的“克星”	209
“现代评论派”的“克星”	216
精神战略与精英战略	221
精英的敌人	229
铸剑	237
鲁迅的“文化山”	244
 第六篇 累 赘	
精英意识	251
“精英意识”对顾颉刚之影响	258
历史的虚无主义	266
“科学的方法”	272
顾颉刚的死胡同	277
顾颉刚的面子：疑古到底	285
再谈“整理国故”	290
 尾声：走自己的路	297

第一篇

疑 古

“整理国故”：胡适的历史观

显而易见，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和他的疑古主义的史学传统，是在胡适“整理国故”的口号下正式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胡适的“整理国故”的“新国故学”的主张又是直接联系着“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倾向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所有这些主张，都有一个共同的对立面，即中国古代书院文化与书院学术的尊古主义的历史观。不论是宋明理学，还是清代学术，不论是古文学派的学术，还是今文学派的学术，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其人生的价值标准不在今，不在己，而在古，而在古圣先贤的遗训。对于古圣先贤及其遗训，只能尊，只能肯定，只能赞颂，而不能反对，不能批判，不能质疑。“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所要批判的就是这种尊古主义的文化传统。他们不再将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仅仅作作为崇拜、尊重、肯定的对象，而是作为认识的对象、研究的对象。而要认识，要研究，主体就是在“今”、在“我”、在“今之我”，对象的性质和作用就不是先定的，而是认识的结果，研究的结果。所以胡适的“新国故学”与“旧国故学”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不首先确定“国故”的性质和作用，不将“国故”先定为“国粹”，而认为既有“国粹”，也有“国渣”，这要通过分析和研究而得以分辨。他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它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现在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

年的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认清了‘国故学’的使命是整理中国一切文化历史,便可以把一切狭隘的门户之见都扫空了。”^①自然“国故”中既有“国粹”,也有“国渣”,不都是好的、对的,那就是可以质疑的,可以怀疑的,所以顾颉刚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疑古主义主张,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是一条沿着“学识”的道路层层递进的关系,也是我们平时经常说的继承与被继承的关系,只不过顾颉刚继承的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而更是“五四”新文化、新文学的传统。但有继承,就一定有变移,到了顾颉刚的疑古主义的历史观,实际已经与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历史观有了本质意义上的差别。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观,而不是同一种历史观的不同表现形式。

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五四”知识分子的历史观是怎样的?统而言之,他们的历史观其实就是当时常说的“进化的历史观”,用我们现在的说法也可以称之为“历史发展观”。在他们看来,整个人类(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应当是停滞不前的,不应该是凝固不变的,而应该是进化的,发展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化发展才是正常的,停滞不前则是不正常的。这联系到中华民族当时实际的社会和文化的处境,更容易得到理解。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青年,再也不能沿着科举制度废除之前“尊孔读经”的老路继续走下去了。教育制度变了,政治制度变了,现实处境变了,文化、人也要变,也要进化,要发展。正像我们现在常说的:“变”,才是“硬道理”;“不变”,是没有出路的。他们这些人是从“旧文化”中刚刚走出来的人,是首先感觉到需要“变”、需要“进化发展”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不是到社会上来当“圣人”的,甚至也不是到中国社会上当什么

^①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